

海南版本
“家底”·人物

贬琼官员
开陈经书,教化民众

海南文献的流传与儒学的传播是分不开的。明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:“善人,武帝置郡之初已有三万之数。”所谓“善人”,是指迁到海南的中原地区的商贾小贩及接受汉化的越人。可见早在汉代,儒家文化就已在海南岛扎根并得到传播。后来,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,以儒学为核心的文献不断丰富发展。海南是古代官员的流寓之地,随着一批贬官的到来,海南藏书量不断增加。如唐代的王义方,到海南后用儒家礼乐思想教化当地民众,“稍选生徒,为开陈经书,行释奠礼,清歌吹龠,登降踞立,人人悦顺”。“开陈经书”自然是用儒家经典教化民众,说明当时儒家典籍已在海南流传使用。

北宋庆历三年(1043年),在范仲淹等人的提议下,宋仁宗下诏兴办儒学:“诸路州府军监,除旧有学外,余并各令立学。”这里的“学”就是“儒学”,朝廷要兴办学校,教授儒学。古时,学校有教学、藏书、祭祀三大功能,所以很多学校有收藏儒家典籍的屋室。海南的府儒学,于庆历四年(1044年)设立,而后各州县也相继创办儒学。府儒学建造之初有殿堂、御书阁、两廡和戟门。宋仁宗时期,朝廷安排国子监教授宋守之任琼州知州,并从东观藏书馆抽出部分藏书赐给琼州学宫。此后,广南西路提刑彭次云上疏奏请派遣监书一员,加强对这些御赐图书的管理。其实这个时期,海南岛的藏书量不多,当时的主官曾几次向朝廷申请赐书。元丰年间,当时的琼管帅李时亮多次为学宫接收朝廷赐书,并特地在大成殿西侧建御书阁一座,珍藏御赐图书。

在各类版本资源中,文献是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最高的组成部分之一。其中的地方文献,是经过长时间搜集整理和研究的集大成者,为一个地方具有标志性的文化遗产。被称为“南溟奇甸”的海南岛,不仅有椰风海韵、细浪沙滩,还有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。这些文献资源的形成和流传,离不开以古代先贤为代表的古今文献人的努力。

典藏卷帙
海南古今文献人:
传之后人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史振卿



丘濬。邱基美 供图



唐胄。
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翻拍



王国宪。陈德雄 翻拍



王国宪发掘整理的《琼州府志》。资料图

明清书院 | 批量藏书,荟萃文华

据《乾宁儒学置书记》记载,元至正年间,海南当时的官办学校购置收藏了一批书籍,量比较大,类型也比较杂,于是想请两个知识渊博的人来管理这批书,众人一致推举唐安寿、王真锡典掌。明清时期,海南办了许多书院,大部分书院都有藏书之处,如明代陈文徽的桐墩书院,在山麓旁边筑室藏书若干卷;明代澄迈知县秦志道修建天池书院,购买书籍200余册,涵盖五经、四书、性理、纲目、通鉴、医术等主题,他还命生员雷应举一一登记造册、收藏管理。清同治九年(1870年),琼州知府冯端本重建苏泉书院,购《十三经注疏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图书充实书院藏书。琼台书院是清代海南藏书最多的地方,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雷琼道道台杨文骏扩建该书院时,从江、浙、闽、广购置经、史、子、集两万多卷,

充实新建的藏书楼藏书,“海外书院多藏书,实始于此”。

与此同时,一些私人创建的书院和学堂,也成为文献收藏的重要场所。攀丹唐氏是古代海南的名门望族,唐震来琼时,带了很多书籍,在琼州为官期间,他特别重视发展文教事业,家中藏书数万卷。为了安置这些书籍,唐家还专门修建了一座“唐子藏书楼”,内藏史书、医书、兵书、农书、玄书,及政论、艺文、数理、地輿等类型书籍。明正德年间,唐胄辞官归乡,建西洲书院,用来藏书读书。王弘海在《西洲书院记》中对唐家藏书有较为详细的描述。明代名臣丘濬自幼聪慧好学,史书称其“博观群书,遍借之市肆,虽释老技术之编亦所不废”“三教百家之言,无不涉猎”。他也喜欢收藏书籍,这在《藏书石室记》中有所体现。

王国宪、王梦云等 | 辑印“丛书”,泽被后学

进入近代以来,搜集整理海南文献的代表人物是王国宪、王梦云、唐品三等。王国宪,字用五,号尧云,晚年号更生老人,海南海口人,曾藏书近三万册,是海南地方文献搜集整理的集大成者。王梦云,海口人,海南书局的创办者。唐品三,名赓尧,字品三,以字行,海口人,参与创办海南书局,并担任海南书局的董事长兼经理,策划并主持出版“海南丛书”。

海南书局创办于1927年。当时,王梦云认为海府地区乃至整个海南岛,之所以被视作“文化荒漠”,其原因在于海南没有一个像样的书局,没有机构版刻海南的文献典籍。于是他设想自己创办书局,经营图书事业,丰富海岛文化。后来经过和唐品三、李开定、孙邦鼎、王硕人等人多次商议和开展调查,最终决定创建海南书局。早期海南书局的业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:出版书籍、贩卖图书、承揽一般的印刷业务。有了一些积蓄后,他们决定把出版海南地方文献作为头等大事来办。

唐品三等人首先与王国宪一起确定先贤文集的种类与体例。20世纪初,王国宪一直在不间断地整理各种海南地方文献,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。因此,海南书局出版地方文献,主要以王国宪的成果为基础,并把这套丛书称为“海南丛书”。大家一致决定由王国宪担任“海南丛书”总编辑,全权负责丛书出版。1927年,海南书局出版了“海南丛书”“第一种”“第二种”“第三种”文集,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

1934年,“海南丛书”全部出版完成,共有二十种。后来,海南书局又陆续出版了《感恩县志》《儋县志》《琼崖建设研究书》等。尤其是1935年出版的《琼崖建设研究书》,销量极佳。1939年,日军强行征用了海南书局,海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进入低潮期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海南搜集整理、出版地方文献的力度不断加大。最有代表性的是,21世纪初海南有关部门支持周伟民教授主编并出版《海南地方志丛刊》《海南先贤诗文丛刊》。其中《海南地方志丛刊》辑录了至今能搜集到的新中国成立前的海南各类府志、州志、县志及其他历史资料共70余种,达1500万字;《海南先贤诗文丛刊》辑录了古代海南先贤的诗文著作共计26种,约500万字。这两部书的出版,是海南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此外,还有一些在台湾的海南籍名人积极整理出版海南文献。如老家在琼海的王会均,在台湾广泛搜集海南方志典籍和地方文献资料,先后出版了《海南文献丛刊》12种。

为了海南文化事业的发展,有些人想尽办法把典籍带到海南来,有些人历尽千辛万苦把先贤的文献保存下来,有些人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搜集整理海南文献,才有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。聆听古今文献人的故事,我们更应懂得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“传家宝”。
(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)